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

魏南枝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20)

摘要: 今天的知识系统显然滞后于现实世界的需求, 需要走出“中西文明”的二元对立叙述, 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全貌来界定过去与当下的世界历史进程。因此, 我们不当简单地把西方文明看成单数的或整体性的, 而应看成一个由多国多民族文明所组成的复数形式和动态过程; 不当拘泥于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中轴, 也不当受西方思维范式所囿, 而是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维范式去思考中国与世界, 发现不同文明形态下独立精神生产的成果; 不当片面地用“此消彼长”的视角来观察新时代的中西文明, 而是要看到不同文明形态在当下所面临的多种共同挑战。

关键词: 中西文明; 西方中心; 不平等; 多元性;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 (2018) 06-0130-05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过去几百年来占据国际体系中心的西方国家已经深陷结构性危机。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各种分歧、冲撞、危机和反思等相比, 我们的知识系统显然滞后于现实世界的需求。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之一就是, 如何走出“中西文明”的二元对立叙述。

“华夷之辨”崩溃之后, 从国家到知识领域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中轴, “中西文明”二元对立模式是19世纪以来在救国图存梦想的强大压力下逐渐形成的。这种中西分野在相当程度上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采用二元对立观的产物: 对内使用“黑暗”与“光明”来区隔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与之后的历史, 将中世纪描述为压制人性的时期; 对外理想化和抽象化欧洲(西方), 使用“西方”和“非西方”、“进步”和“落后/原始”来将世界进行二元

区隔, 将非西方世界贴上野蛮、专制或威权等标签。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所采用的二元对立叙述的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 按照西方的需要和要求将非西方世界进行改造、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改造是西方中心视野的自觉行为, 赋予了欧美国家对外扩张、殖民和实施霸权的正当性, 也赋予其摧毁其他千年文明的合理性。

黑格尔说, 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 经过“筛选”以后, 才能被正式带入历史进程之中。^① 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在遭受“他人的逼迫”, 但历尽内忧外患的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并没有被完全肢解, 反而具有了深重的民族和主权国家危机意识, 这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成功实践中国道路的重要基础。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但并非被“筛选”“带入”历史进程。

收稿日期: 2018-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反思研究”(18BGJ061)

作者简介: 魏南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美]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 廖世奇、彭小樵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65页。

当前世界的“历史进程”显然不再是黑格尔所定义或期待的，需要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全貌来重新界定。为此，我们亟待走出原有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首先，不应当简单地把西方文明看成单数的或整体性的，而应看成由多国多民族文明所组成的复数形式和动态过程；其次，不应当拘泥于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中轴，也不应当受西方思维范式所囿，而是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维范式去思考中国与世界，发现不同文明形态下独立精神生产的成果；最后，不应当片面地用“此消彼长”的视角来观察新时代的中西文明，而是要看到不同文明形态在当下所面临的多种共同挑战。

一、探求西方文明的多元性

什么是“中西文明”所指的“西方”？“西方”是一个纯粹的整体性概念吗？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中西文明”这个二元对立叙述，其实质是文明单一性准则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西方文明优越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信念，或者是以人本主义形式出现的、用“文明人”（西方人）与“野蛮人”（非西方人）对人类世界所进行的二元划分。

如卡赞斯坦所说，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历史来看，那种认为“西方”有着一成不变的集体身份认同、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内聚力并且凝固不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①自由主义者虽然承认任何特定文明内部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范式，但是坚持世界上只有在西方理性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行为准则才是正确的、因而西方文明是具有普世性的。无论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面对非西方世界和非西方思维范式时，都会从不同角度坚持西方中心论，因而忽视或者刻意淡化了西方文明内部的多元性和动态性。换句话说，将“西方”视为整体性概念，主要是针对“非西方”而言，是从精神上改造“非西方”所必须的。

欧洲人在对外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强化了欧洲归属感，欧洲归属感背后是欧洲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傲慢情结，这种情结在19世纪达到顶峰。随着

世界领导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特别是20世纪末冷战结束、美国确立了全球首要地位，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方国家全面获得全球领导权，西方中心主义再次确立，并且登峰造极为美国中心主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方纳所说，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②借助现代化、全球化等各种形式，美国的对外文化扩张与其利益扩张同时进行，有利于其把持对世界的文化领导权。

其次，对中国而言，“西方”这个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是模糊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或人种概念，甚至日本一度被中国视为西方列强之一，而长期被中国视为西方国家的俄罗斯被西欧国家坚持作为欧亚国家而不接受其为欧洲国家。

即使是欧洲，在埃德加·莫兰看来，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③欧洲的四大文明源头——犹太—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拉丁文化，要么如前者源于亚洲，要么如后者根植于欧洲边缘的地中海地区，数千年来既有冲突也有交融，历经多次宗教大分裂和宗教支派的分裂，历经近千年的大量宗教战争和后来的民族国家战争，和伊斯兰商贸圈、维京文明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但形成一个躁动的动态文化概念上的欧洲，也形成了一个事实上多中心的欧洲——欧洲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实体，欧盟的前景晦涩不明，反过来证明欧洲内部不同文明源头和文明形态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大于其吸纳与融合，“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概念的欧洲认同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所以，所谓欧洲文明是复数形式的多元文明形态的统称，而不是单一文明形态的整体性描述。

虽然美国有明确的国家疆土边界，美国文明植根于欧洲文明，但因不同族群的移民的涌入而不断多元化。之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发展到70年代承认文化沙拉碗(Salad Bowl)的现实，直至90年代将其文化建构过程和结果视为“织锦”(Tapestry)，就是因为亨廷顿在对“我们是谁？”的担心中所强调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事实上不足以统合与代表日益多元化的美国文明。今天的

① [美] 彼得·卡赞斯坦：《一个多重与多元文明的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5页。

② [美]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页。

③ [法]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页。

美国文明具有多重性,近两年美国内部各种形式的文化冲突更证明多元化与多重性的加剧。

最后,美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并非完全一致的概念,一方面美国中心主义遭致西方世界内部的质疑乃至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困境导致各种“去西方中心主义”力量的增长。

尽管对世界上很多国家而言,美国的诸多方面已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标尺,占据了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地位;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全球文化已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

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欧洲大陆文明的长期分野、新教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区别等,使得抵制美国的文化冲击几乎构成了相当比例的欧洲人的世界观。例如在经济与军事能力无法与美国抗衡的同时,法国知识界仍然排斥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标记的价值观、公司、电影等,顽固地抵抗美国借全球化而推行其文化帝国主义。

2017年在夏洛茨维尔爆发的种族暴力冲突引爆了美国多地的抗议与骚乱,被视为一场美国的“文化战争”或者“另类内战”的开始。2018年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等说法表明美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实质性变化。美国内部核心价值观的撕裂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和欧洲国家所构成的西方文明内部价值体系的自洽性,并且正在变相地失去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占据的领导世界的“软实力”基础。

对所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单向度发展理论,在实践层面正在因各国现代性的差异背后体现的各自文明特性、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互动而呈现的多向度演进而受到挑战,在理论层面也因西方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斗争而受到质疑。这些挑战和质疑伴随着非西方世界崛起,促使也需要知识系统在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走出以“中—西”二元模式为中轴的思维范式,更多地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从“中—西”走向“中国—外部世界”

从“中—西”走向“中国—外部世界”是否意味

着用“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来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那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版本,仍然没有跳出西方知识系统制造的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等。所谓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说法,也不过是西方扩张史或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延续,又或者是中国被彻底“西方化”的力证罢了。

数千年人类历史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各自的文明形态;各文明形态不断交流和碰撞,形成多个特点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此类似,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不同文明和谐发展。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在与其他群体的联系、交往和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不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自古就有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例如印度和东亚之间、非洲与阿拉伯地区等。此外,经由阿拉伯世界将中国的文化与物产传递到欧洲,对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是,1492年所谓地理大发现本质上是“资本的大发现”,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其暴力性与扩张本能。一方面,西欧内部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手工业、工场发展到大工厂等,直至各种跨国性企业;另一方面,其工业发展以外贸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优势为保障,不断用殖民、移民和侵略、战争等方式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

上述两个方面相结合的时代,一者是欧洲和后来的美国基于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权的信念、改造非西方世界并成为世界中心的时代。雷迅马认为,“树立了美国的这样一种身份:一个帮助那些苦苦挣扎中的社会走上它自己的经历所指明的道路的发达国家。像更古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天定命运论一样,‘新边疆’口号中的现代化如此界定作为仁义之邦的美国的好处:它有能力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①再者是欧美国家用一整套西方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规律来诠释其他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发展历程、规定其发展方向的文化殖民时代。例如西方将编纂其历史的方法论带入非西方,亚非拉地区长期深受西方奴役,在自主

^① [美]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性被剥夺的同时也沦为由西方编纂历史的被动体；甚至在黑格尔看来，非洲本土“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①。

这些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和偏见，就是要实现葛兰西所指出的文化霸权，从意识形态上固化所谓“中心—边缘”的区隔。而由西方人用西方视角来编写亚非拉地区多个国家历史的行为，符合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推广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方式的行动和思维是最自然不过的；人们一旦接受这种“自然法则”，就会自觉地复制这种行动和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复制来再现特定的权力关系。

中国要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中—西”二元对立叙述走向用中国自身逻辑来思考和发展“中国—外部世界”的关系，就必须如赵汀阳所反复强调的，恢复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因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已经沦为所谓西方征服世界史的附属或者分支。经历了过去近七十年的奋斗与积累，中国在器物层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重新拥有了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然而，如何在文化层面重建自信，恢复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难点所在。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意味着坚持“中国特殊论”、放弃“普世价值论”吗？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由美国和跨国资本联合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反过来导致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失序、华盛顿共识陷入困顿，随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蔓延到世界多地的冲突和不平等的不断加剧，人类社会需要追求更多的人民性、追求更好的公平正义，这给世界各国根源于自己本国发展来探究“另一种可能”、让“普世价值论”回归为西方自己的普世价值等提供了现实土壤。

因为如果不敢甚至不愿意反思西方所主导的规则失效或秩序失灵，就只能认命地期待自己不是这种失序、失范所带来的极端后果的受害者。那么，在各种所谓西方思想启蒙之后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人”，是否实际上已经在各种理所当然之中部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在片面强调个人权利对抗公权力这一对关系的同时悄然掩盖了劳动权利对抗资本

权力这一对关系，让资本的肆意性得不到有效的节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仅停留于独立自主的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还要善于发现不同文明形态下独立精神生产的成果，并且推动不同文明形态能够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维范式去思考自身和再写世界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所谓“中心—边缘”结构和通过“自然法则”所不断复制的特定的权力关系，才能把所谓普世价值回归到西方普世价值，才能做到“以世界为世界”，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所产生的重要积极意义所在。

因此，不应当拘泥于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中轴而忽视朋友遍天下，不能仅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给世界做贡献的唯一标准而忽视了基于自己民族发展历程与理念的世界观给世界知识系统做出贡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这样，中国道路才能真正被世界各国所正确认知和接受，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可能”。

三、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同挑战

美国的帝国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当然不是。世界正在朝多极化和多向度发展，审视新时期的中西文明对此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同时还要看到今天不同文明形态所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仍然在持续增长，本文将例举其二进行探讨。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各国追求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两种利益追求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

资本力量日益突破主权国家的约束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导致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甚至相当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日益被国际资本力量所侵蚀，由西方国家与国际资本力量联手建立的国际经济规则不断地改变着各国国内相关立法与实践。追求主权国家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国家与寻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资本二者，在最终价值追求上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呈现出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各国内部政党矛盾和社会矛盾、国际资本利益与国际政治关系等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局面。

这种复杂局面，在文化领域体现为全球文化与既有的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43页。

由跨国资本所控制的媒体和信息系统在散布全球文化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图使世界各地各阶层的民众自觉主动遵从其逻辑。全球文化的发展，已经带给世界各国原本基于民族性的文化认同危机，而这种危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尤为严重。如黄平所发现的，“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①这种在“不平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必然会使为数众多的“后发国家”和“外围国家”产生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或“自性危机”，使得各国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受到限制。

全球文化具有多元互动性，随着非西方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人口全球迁徙的加强，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也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这有利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觉，有利于生活在不同文化体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因此这种危机感不仅仅来自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跨国资本所带来的全球文化也有反思乃至反抗，其结果是文化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反过来证明了全球化的多向度演进的趋势。

其次，劳资失衡和贫富悬殊的持续恶化、新技术的迅速进步等，共同带来新的不平等性的增长。

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资本的全球性肆虐，并没有实现所号称的“共享收益”，而是在突破国家边界，将全球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财富越来越积聚的少数的巨富阶层，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受雇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导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劳工权益受损和中产阶级萎缩。西方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曾经享受远高于被殖民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今天却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被抛弃者”。全世界相当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族群的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等逐渐“被拉平”了。未被二十国集团所覆盖的其他“边缘”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呈现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失

控局面，所谓失败国家的普通民众沦为被“抛弃”者。其结果是，以美国内部文化冲突为代表的西方内部文化多元性的张力在上升，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因战火而毁坏千年文明遗址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正在再度遭遇文化劫难……

信息技术、生产自动化技术和生命技术等不断进步，极大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峻。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环境的肆意污染，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不断冲击人类伦理、新技术的使用带来各种不确定性。此外，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大数据越来越由类似亚马逊、淘宝、腾讯等主要电商所掌握，对政治国家掌握信息、监督社会和支配暴力手段等方面形成了事实上的冲击。上述技术进步背后往往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组织社会的能力的进一步膨胀，因资本能力、对新技术的了解等方面的差距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不平等性在增强。作为生产形态的科学技术既是文明的构成要素之一，也对不同文明形态和社会成员客观上产生深远而且差异化的影响。这些差异化和新的不平等性都会凸显和加剧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专业化制度化管理自身的脆弱性和政治机制的脆弱性。

面对上述挑战，如阿里吉所说，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或失序最终将变成现实，主要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南方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能不能为自己和世界开辟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比西方致富的那条道路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环境上更可持续。^②

结语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重建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的立法能力，不是简单地搬用某个教条或者回到传统文化去寻找灵丹妙药，更不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而是采用既独立自主又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有创造力的想象和实践，以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秩序重构进程中的各种新挑战。

责任编辑：董宇宇

^① 黄平：《全球化：一个新的问题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45页。

^② [意] 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9-392页。